

为工业 4.0 培养新工人③

一些工种技术证书享受待遇低的难题有望破解——

浙江特级技师将享受教授级待遇

本报讯(记者倪佩然)本报上周《新工人缺少专属成长沃土》报道中提到,不少工人因为没有高学历,技能证书不能有效提高待遇,尤其是对岗位晋升用处不大。这一难题在浙江有了解决办法,浙江省内技术工人除了暂时不享受院士的职业上升通道与待遇外,与工程师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再无区别。这是日前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出文件(浙政办发[2015]25号)建立特级技师制度规定的——特别优秀的高级技师可以晋升特级技师,特级技师的相关待遇参照教授级高工执行。

浙江省人社厅职建处处长项薇介绍,作为制造业大省,浙江一段时间技工短缺非常明显。为给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浙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破除职工身份界限,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与工资福利待遇的政策。力争到2017年新增高技能人才60万人。

据浙江省人社厅透露,目前,全省企业退休(退职)的高级技师资格人员统一到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类别,每月增发400元的退休金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支出。企业在聘的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分别对应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享受同等工资福利待遇。对获得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用人单位在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不低于大专学历毕业生。

目前,各县市区的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工资福利待遇不一样,尤其是退休以后的待遇差别较大。而随着新文件的出台,这样的局面将得到彻底改变。

“对我们这些靠‘手艺’吃饭的职工来说真是福音。”来自宁波明欣化工有限公司的

焊工、高级技师陈俭峰这样说。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对高级技师的各种福利、奖励一直没有固定。“早些年是一个月25块钱,后来有段时间连这25块钱都没有了。现在是宁波这边出台了政策每年给我们6000块钱。”

陈俭峰表示,该文件的出台意味着职工的地位进一步升高了。这项政策将激发职工提升技能水平,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积极性。

“我觉得以后考证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就比如我,现在是高级技师,那也该准备考特级技师了。本来以为就到头了,没想到又有了努

力的方向。”陈俭峰说。利好消息得到了职工们的欢迎。那么,企业方又如何看呢?记者随后采访了部分企业主,他们则认为,如果国家技能等级认定能够进一步贴合企业经营的实际需求,这样的政策就真的再好不过了。

“我们在实际经营中就感觉到,现在国家的考级可能有些滞后了,比如一些工种里面没有,或者是一些考到了证书的职工实际上岗却没那么好用,我们希望在哪些方面能尽快加以改革。”永康一家生产厨具的企业主说道。

人社部发布: 劳动诉求解决途径有十种

本报讯(记者罗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群众诉求解决途径”。目前解决群众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相关诉求的途径主要有10类。

首先是调解仲裁。适用范围包括:在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人事关系、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劳动报酬、辞职辞退、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赔偿金、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发生的争议问题。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可以向所在单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或本单位所在地乡镇、街道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也可在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应当自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其次是劳动保障监察。适用范围主要是:对用人单位在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情况,以及对职业中介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制止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人社部提醒,劳动者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应当在用人单位发生违法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2年内提出。

三是行政复议。适用范围是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复议申请人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四是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复核。适用范围是不服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五是申诉。适用范围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服人事处理决定等。

六是检举控告。适用范围是人社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方法是向所在地行政机关注检控告。违反党纪的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七是信息公开。方法是按照“谁制作,谁公开”的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社部门申请获取可公开的政策性文件等信息。

八是政策咨询。主要适用于人社领域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可以拨打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询服务热线。

九是信访。主要用于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涉法涉诉问题除外。群众可以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社部门提出。人社部提醒,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十是诉讼。适用范围是不服仲裁裁决或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数量短缺供求失衡提前推高了部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不过,便宜服务的时代早晚过去——

大城市,一些服务业劳动力成“奢侈品”

专家认为,对于城市发展来说,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生活环节都是互补的

■本报记者 杜鑫

与丈夫认真地讨论了5次之后,刘喜,一个曾被入艳羡的北京市事业单位职工,最终决定放弃育儿月嫂,辞职回家带孩子。“一个普通育儿月嫂月薪四五千元,好点的上万元。我的工资刚够育儿月嫂的起线,不如自己带。”30岁的刘喜感慨如今“人力”价贵。

“有的月嫂好几万元一个月。”她把调查的育儿月嫂和月嫂的价格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引来白领朋友一片带“泪”的回复,好多人“摩拳擦掌”询问哪里找这工作去。

不仅仅是月嫂,近日一则《广东2014年工资指导价:高级餐饮服务员工月薪2万》的新闻再次轰动了白领们。

在大城市,一些人急需的消费服务业劳动力价格飙升,屡屡引起惊呼。在北上广深,人们常常感叹,月嫂、餐饮服务、按摩技师、快递员等简单劳动低端劳动力如今已经成了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低端劳动力”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北京人大常委曾描述为“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低端劳动力大多从事技能相对较低的体力工作。一方面人们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却和大城市的发展似乎“格格不入”,低端劳动力常常在大城市扮演着“又爱又恨”的角色。

愿从事简单劳动的人数量减少

“消费性服务业中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是世界性现象。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会发生结构性摩擦,某些服务业从业人员越来越紧缺,因而价格也会越来越高。”南京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认为,供求失衡导致了一些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

尽管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还存在争议,但是中国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的事实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2013年末减少371万人。这已经是我国劳动力人口连续3年下降,并且趋势有所扩大。农民工数量也在出现微妙变化。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尽管农民工总数增加,但是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从长远来看,农民工的供给减少是趋势,而低端劳动力大多是农民工。

与此同时,愿意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数量也在减少。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了基本的生存压力,又脏又累的简单体力活

很少有人愿意做。

多个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的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渴望融入大城市的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从事低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

此外,刘志彪指出,一些低端服务业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也是年轻人不爱入行的原因。

由于供给短缺,大城市的“用工荒”近年来成了常态化。北京市职介中心2011年就发现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缺口最大。北京家政研究协会曾做过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全北京家政服务人员需求量达到121.6万人,实际服务人员只有53.78万人,总缺口达到67.82万人。

便宜服务时代早晚过去

“中国早晚会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普遍会比较贵,普通市民享受便宜服务的时代早晚要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看来,发达国家从事类似带孩子这种服务工作的劳动力是“奢侈品”。

然而,中国现在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事餐饮、居民服务等工作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超过2500元。一些低端劳动力提前成为“奢侈品”,才出现了像刘喜这样的普通家庭惊叹保姆工资高的现状。

在多个公开场合呼吁大城市不应盲目限制低端劳动力的陆铭指出,来自家乡的“吸引力”和来自大城市的“排斥力”两股力量让低端劳动力离城市越来越远。

根据调查报告,尽管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但是在东部地区和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工资水平仅仅相差200元左右。宋清辉表示,原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入到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在自己家门口也能找到工资不错的工作,当然愿意离家近一些。

此外,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中西部地区吸纳本地农民工就业的能力持续增强。而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也使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人重新回到乡间。调查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4年,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在家乡不断吸引本地农民工的同时,大城市却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他们。“2003年以来,大城市房价增长过快,生活成本高企。”陆铭说,在客观原因逼退部分农民工的同时,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也在“误伤”农民工。

据悉,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规模成了诸多城市的难题。在诸多控制人口的措施中,“以业控人”成为不少城市的主要选项。一些城市直接将“矛头”对准流动性强、替代性强的低端劳动力。某市的一份关于“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专题调研报告中就建议,政府应出台措施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CFP供图

此外,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提出“苛刻”要求,则让不少农民工知难而退。陆铭认为,一些人为和体制上的问题,导致了劳动力不流动存在障碍,加重了大城市低端劳动力短缺的现状,进而推高了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价格,结果让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被提高”。

不同技能人口应合理配比

“这种高价本身是非理性的,”陆铭认为,中国当前需要逐步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些城市管理者应该摒弃“排斥低端劳动力”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低端劳动力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吸引高端劳动力,特别是在落户上给予政策倾斜。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优质产业的进入也需要配套的低端服务业,高端人才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需要相应的低端服务业来支撑。

陆铭也认为,低端劳动力和高端劳动力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配比。他在近日公开发表的《盲目控制人口伤及城市自身》一文中列举了美国的研究数据:在一个城市里面增加1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会带来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而这5个里面,有两个是高端劳动力,如律师、医生,另外3个就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服务员或者售货员。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的流动比例,其实就是1:1,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生活环节,他们都是互补的。”陆铭说。

月嫂许岚:“新知识永远要学习”

■本报实习生 任怡婷

5月16日早上6点,在北京西城区陶然亭路一小区,孩子还在熟睡,月嫂已经轻手轻脚地开始忙碌了。许岚,东北人,49岁,干月嫂这行已经14年了,她非常红火,等待排队的客户已经预约到2016年,她的月薪比一般的上班族“唾舌”,26个工作日的月薪已经达到39800元。

初夏的清晨,7点时的太阳已经明晃晃,许岚已经把孩子一天的食物准备好了。“宝贝,宝贝,早上好!”伴随着轻轻的呼唤,小宝宝睁开睡眼,“咯咯”地笑了。一天固定的几次喝水,4-5次喂奶,带孩子出去晒太阳,和孩子互动等等都是许岚的日常。

不仅要照顾好孩子的身体,许岚还要肩负起培养孩子性格、早期开发孩子智力的重任,每天还要给孩子做早操、唱儿歌、背唐诗。除此之外,许岚还要给产妇做营养餐,指导产妇照顾孩子,帮助产妇下奶等等。晚上也要给孩子按时喂奶、换纸尿裤等,几乎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一天下来,几乎没有太多空闲。许岚服务过的家庭有银行高管、汽车

店经理、房地产公司经理等等,经济条件大多很好,很愿意为孩子付出,同时这些人通常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能在家陪孩子。

对于自己的高薪,许岚很淡定,她说,如今月嫂的要求也很高,知识、专业技能、经验、身体健康,甚至包括心理素质(医学知识以及普通话等等)。月嫂在上岗前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照顾产妇,怎样给产妇和婴儿配营养餐,孩子容易出现哪些疾病等等。要想成为月嫂,还需要很长时间的从业经验。

晚上7点哄着宝宝睡着之后,许岚便开始一天的学习了,“我每天都会看书,自己买的专业的书,还有现在微信、网上都有大量新鲜的知识,这些内容都应该好好吸收。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在这个行业干了很多年就有很多经验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永远是要学习的。”好学、勤奋、专业,这正是她能一直保持优秀的原因。

许岚爱孩子,她说面对孩子的时候必须保持微笑,她甚至要求孩子的父母,如果不开心的话先在一边把自己情绪调整好再与孩子,孩子哭闹的时候大人一定不能烦躁。“孩子是很有灵性的,带孩子的人必须灵敏。”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本报记者 郑莉

“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将不再接受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援助。”2003年底,WFP向全世界发布这一信息,这意味着中国从一个粮食受援国变为援助国。

“中国用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了全球1/4的粮食,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当人们如此描述中国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解决温饱问题取得的成就时,会不约而同提到一个重要人物——袁隆平。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从此迈开双腿,走进水稻的莽莽绿海;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路线;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实现百亩连片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和1000公斤的四期中国超级育种目标。

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踏实工作了一辈子。他心中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今,联合国粮农组织已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袁隆平更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为此,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他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已耄耋之年的袁隆平最喜欢做的事,依然是站在金灿灿的超级稻前,闻着稻穗的清香,看着曾经的梦境一步步变为现实。



【人物检索】

潘兰英: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工会干部,工会维权品牌——湖北黄石市“潘兰英职工维权热线”办公室原负责人。从“留守工会主席”到2009年被评为“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她是职工的贴心人。

潘兰英:职工贴心人

■本报记者 郑莉

2009年9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金色大厅里传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职工”的每一个诉求,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站在主席台上,潘兰英声音颤抖,十余年为职工维权的点点滴滴顷刻间涌上心头。

1994年,潘兰英所在的黄石丝绸厂破产倒闭。全厂685名职工有665人要下岗,161名退休职工生活没有了着落。35岁的她决定留下来,当“留守工会主席”,从此踏上了为职工维权的道路。

担任“留守工会主席”的6年里,潘兰英常常是上午跑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下午看病,晚上还要走访特困户。通过她的帮助,170多名下岗职工找到了新工作,180名退休

职工领到养老金,200多户特困家庭走出了困境。而潘兰英自己,每年只领取563元津贴。

2000年,敢于为职工维权的潘兰英担任了黄石市铁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她带着同事们跑遍了全区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为25家停产半停产企业和1200户特困职工建立了档案,推介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5731人,累计免费培训下岗失业人员2700多人,就业和再就业率达到100%。

2005年9月13日,黄石市总工会组合社会资源,成立了“潘兰英职工维权服务热线”,潘兰英任热线负责人。10年间,该热线已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会维权品牌。

2014年底,潘兰英退休了。但“潘兰英”这个名字将伴随维权服务热线,始终立足于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第一线。

群星璀璨·劳模身影



【人物检索】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因成功研制“超级稻”种植技术,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带领团队不仅为中国更为世界解决“吃饭问题”找到了有效途径。